

马克思主义研究



从“历史意识”到“历史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历史方法论

林国标

(海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海口 570228)

【摘要】历史方法论不仅指研究和理解历史的方法论,更主要的是指把“历史”本身当作一种方法进行广泛运用的思想和行为倾向。“总结历史经验”就是历史方法论在新时代的综合运用,它甚至本身就是历史方法论的新形态。中华民族具有深沉的历史意识,古代的历史意识中,包含了“法先王”“稽古”“殷鉴”“治道”等方法论原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将唯物辩证法与传统历史意识相结合,发展出以实事求是、辩证的历史观、辩证的认识论、群众路线等为主要内容的理论与实践方法。在新时代,着眼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大历史观”,倡导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法论体系。“历史经验”就是这种方法论体系的新形态。作为一种方法论体系,“历史经验”通过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战略思维等各种具体思维方法对现实发挥作用,并推动历史和社会进步。

【关键词】历史意识;历史经验;历史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D61;B0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1710(2022)06-0008-11

【DOI】 10.15886/j.cnki.hnus.202206.0164

本文的历史方法论不仅仅指研究和理解历史的方法论,更主要的是指把历史本身当作一种方法进行广泛运用的思想和行为倾向。

任何一种理论都有自己的方法论,它与世界观一起构成这种理论的哲学基础。中华文明有许多著名的哲学思想,这些著名思想都有各自独特的方法论体系,在这些多样的方法论体系中,有一种具有“本原”地位的方法论,本文称为历史方法论。中国古代的史官传统培育了中华民族深沉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表现为坚持对历史保持敬畏,并倾向于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和总结来为现实提供经验参照。这种以历史为镜鉴的方法,经过无数代人的实践和完善,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这种历史意识与唯物辩证法相结合,形成了实事求是、辩证思维、历史思维、战略思维、总结历史经验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方法。把历史作为方法来驾驭规律、治理社会、筹划未来,正是中华文明一种重要的文化基因和文化性格。因此,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考察历史方法论的历史演进,揭示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中对该方法的实践运用和不断创新,见证该种方法的历史影响和现实功用,对于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成就,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一种古老的方法论传统

历史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被广泛运用,特别是在治国理政实践中被运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这有赖于中华民族有一种独特的历史意识,这种独特的历史意识表现为敬畏历史、记录历史、探寻历史、运用历史,依托深厚的历史背景而面向未来。

如果把历史意识理解为人类对自身的发展变化过程的感知和反思的话,每个民族都可能有自己的

【收稿日期】 2022-06-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00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BKS030)

【作者简介】 林国标(1965-),男,湖南衡阳人,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研究。

历史意识,而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却具有独特的外观和内涵,即对历史的纵深度、贯通性、现实性有一种特别深刻的感悟。对历史纵深度的感悟,指思维的触角有着往历史深处溯及的意向,通过逆向地对历史“岩层”的反复碰触,感悟完整的历史过程以及历史的深邃与厚重。对历史贯通性的感悟,指把过去、现在与未来贯通起来,打通古今间隔,以未来的视野巡视历史,以历史的视野瞻瞩未来。对历史现实性的感悟,指不把历史看成是虚幻记忆或某种心灵幻象,而是坚执于历史的客观真实性。历史是一切文化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一切是非判断的依据。“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战国策·赵策一》)、“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过秦论·下篇》),这正是古人充满纵深感、贯通感和现实感的历史意识。因此,“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1]。中国古代无处不在的历史意识,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便可见端倪:

首先是庞大的历史经典体系。因为对经验性知识的执著和“慎终追远”的信仰,古人习惯把过往的事件忠实地记录下来,从而为后人翻检历史提供了巨大的方便。中国古代的著名经典大多是历史文献。《尚书》被认为是西周王朝官方的文件汇编,也就是原汁原味的历史资料。《诗经》中有许多关于当时社会风俗、宗庙礼仪、君臣诫勉、朝拜宴乐、先祖创业等历史事件和历史场景的记录。《礼》介绍和考察了历史上中国人行为的基本规则及其流变。《易》记录了古代先民活动包括巫祝活动的史迹,成就了《易》占卜的经验基础,也是作者构建逻辑形式、认知模型的原始材料。《春秋》本身就是典型的史书。所以,章学诚“六经皆史”并非妄惑之言。

其次是完备的史官系统。中国从很早时候起,在国家的管理系统中就设有专门的史官,史官的职责是记录帝王和各级官员的重大活动及言论,还要负责保管和整理国家的历史档案。中国古代史官与其他文化中的“祭司”有所不同,其职责不是求得上天庇佑,而是通过记载君主的言行而申明“大义”。虽然早期史官有部分祭司的职能,但随着西周以来人文思潮和德治思想的流播,其沟通天神的职能逐渐弱化而通过记载君臣言行发挥“慎言行、服法式”的儆戒作用则得到强化。

再次是祖先崇拜。中国原始宗教属于多神崇拜。多神崇拜的发散性特点,孕育了中国自古以来无神论的传统,淡化宗教意识而强化历史意识。历史意识被强化的表现就是祖先崇拜。祖先崇拜来自先民对自身部族发展过程和氏族认同的追忆,是一种集体的历史记忆。“祖先”只是一种象征和符号,祖先的身上寓含有过往的重大信息。因而,祖先崇拜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意识的产物。祖先崇拜就是对本民族历史的崇拜,是对本民族世代不懈奋斗过程的赞颂与敬仰。

最后是丰富多样的民间史学。在传统中国社会,街头巷尾充斥大量的稗官野史,民间文艺中涉及大量的历史传奇。儿童的启蒙教育也一贯重视历史知识的灌输,把历史故事与道德教化、识文断字联系起来。古代官吏的选拔和考核,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居重要地位。在知识阶层中,历史的学养被看成是文化修养和道德水平的体现。对历史研究做过贡献的人,被认为是拥有学问、德配高位的人。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更多的是历史的研究,古代的学问更多的是关于历史的学问。

东西方民族的历史意识是不同的,中华文明的历史意识具有强烈的“崇古”倾向和“稽古”情节。也正是基于这种不同,某些西方学者还对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颇具成见。如,“中国史学从未发育出一套自我批评机制,以及发现历史真相的机制,从未对历史归纳展开无情考量,也从未对文献卷宗实施有目的的追索以便证明相应的假设,而这一切正是西方史学的特质所在。……历史问题的缺失,令中国人的心灵很难触及历史问题”^[2]。这位J·H普勒姆先生从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观出发,运用理性主义历史观,从概念出发来理解和整合历史经验。所以,他不能理解中国对历史问题的发现和解决方式。殊不知中国传统经典解释学已经证明了中国人的历史意识不仅触及了历史问题,而且比他们更深刻地触及了这些问题。中国史学尽量按本来的样子记录世事而不是从某种预设的理念出发,将历史事件视为论证某种观念的素材。因而“中国古典思想不需要抽离‘质料’而是从‘质料’出发,在具体的‘行事’中展开历史的思考,理解历史的基本范畴乃是通过行事系统化而获得”^[3]。

古代的历史意识,不仅决定了中国传统的对待和理解历史的方法,也决定了其运用和创造历史的方

法。古代的历史意识大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或者说包含以下的方法原则:

1.“法先王”

这与祖先崇拜信仰一脉相承。如“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荀子·非相》)。“法先王”常常被人指责为历史的复古主义,与现代化的进化论思想不合辙。实际上,“法先王”恰恰体现了中国古代的人文精神和在历史问题上的无神论传统。“先王”代表了历史秩序,也代表了历史的最高理想。“法先王”就是回归某种历史的理性和历史精神。同时,“法先王”是远古天命信仰的遗留,并蜕变成了伟大的人文精神传统,即对人掌控和驾驭历史的深深的自信。有学者对这种现象做了说明:“西周人对天命的信仰从表面上看还披着神意的外衣,但从实际上看,‘天’已被看作最高道德、最高正义的终极存在,‘以德配天’就是圣哲们对这个终极存在的精神追求。这种宗教精神与其说是崇拜天,不如说是崇拜天所代表的道义权威。”^[14]李泽厚也认为,历史意识的发达是中国实用理性的重要内容和特征。“荀子、《易传》则将这种历史意识提升为贯古今、通天人的世界观。把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铸为一体,使历史观、认识论、伦理学和辩证法相合一,成为一种历史(经验)加情感(人际)的理性,这正是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15]人间有圣王,自然有天命,在古代天人合一的视域下,圣王吸纳了“天”的功能和内涵而成为历史的终极存在,即代表最高的道德和最高的正义,“先王之道,仁之隆也”(《荀子·儒效》)。所以,“法先王”思想贯穿着这样一种原则:以最高的道德和最高的正义来观察和分析历史,或者说通过分析和总结历史来寻找最高的道德和最高的正义。

2.“稽古”

语出《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稽古”指考察古代事迹以明辨是非。作为历史方法的一部分,“稽古”原则要求人们在人世的各种活动中应多多地总结历史的经验,稽察历史现象,从中总结规律。如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中庸》)、“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论语·卫灵公》)。孟子说:“《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上》)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这些都体现了“稽古”原则。

古人在天人合一视域下,把对自然现象的研究归并到对社会和历史现象的研究。因为这种稽古精神,中国人呈现历史的方式与西方不同,通过原汁原味地呈现历史原貌而体现对历史的敬意,而不是从概念出发随意剪裁历史材料。这种方式类似于王船山说的“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16]。所以,钱穆认为,中国史学的精义就在于其“分年分人逐年逐人”之记载,“客观而细密地记录下此种材料,保留着以往历史之比较真实性,便易使此后各时代人,继续对此等材料不断作自由的探讨,使此后人对以往历史不断有新鲜活泼之启悟与发现,易于使人永远对以往历史有新体验”^{[17]22-23}。

在物理时空中完成的事业,终会成为历史,所以历史是一次性的,也是不可逆的,但在人的思想和观念中,历史却是可逆的,可以在人的体验和思维中反复打开并重新经历和体验。为了保证这种体验的本真性,中国的历史意识要求以客观原貌呈现历史,就是为了保证在既成事实的体验中顺势展开新的行动逻辑和行动脉络。

3.“殷鉴”

语出《诗经·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其意思是说,殷商覆亡的教训并不远,就在夏桀的那一代。对商来说,夏桀就是教训;对周来说,殷纣是教训。可见,“殷鉴”作为一种历史意识和方法论原则,应该是对历史事件、历史案例特别是负面案例进行分析总结,找出与当前事情的内在关联,从负面的案例中找教训,从正面的案例中找经验。就是以历史案例为参照找到解决当前问题的办法,或者说为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预案。“殷鉴”作为一种历史意识和方法在历史叙事中的表现,钱穆通过《资治通鉴》做了生动的说明,他说:“若读《通鉴》,引诸事浑融一贯,可见其在此时局下之一全相。既不分别独立各为一事,则其间之相互关涉,相互牵连,孰为因而孰为果,孰为主而孰为从,其所影响于后代者轻重久暂各

如何?其复杂错综之情,在作史者惟求按年分列,初若可以无所用心,而读史者则已往史迹俱陈,如入建章宫,千门万户,内自相通,已可恣其随心游览,由此门出者,由彼户入,由彼户出者,由此门入,一宫之建造,则决不以一门一户为限隔。如此,乃能使读者了然于当时历史之真相。”^{[7]158}

在通过历史记载物审视历史事件时,你会不自觉地把不同的历史事件关联起来,构建起一种有机的历史场景。同时,也会把前后的历史事件,特别是把过去与当下的事件联系起来,构建起一种历史连续性的意识。“中国历史有很强的延续性,这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分外强烈。”^[8]由这种历史的连续性意识又产生了对传统的传承意识和传承责任。这就是“殷鉴”方法在现实中的体现。

4.“治道”

古代历史方法论除了具有自己的世界观基础之外,还有自己的价值指向,这种价值指向就是“治道”,即寻找恰当的治国理政的方法。古人崇尚历史,但不是为历史而历史,主要目的是通过“稽古”“殷鉴”找到应对当前治理问题的良好经验。所以,古代历史方法论适用的领域除了个人的道德实践和人生修养外,主要是政治领域。周代史官的设置,本来就有明确的为王朝政治服务的目的,史官编史记事,根本就不是为了收集和保存历史资料供学术研究,而是为了发挥政治功效,为国家治理提供依据和参考。“史官记事编史,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政治行为,周代史官记事编史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监察君臣,二是为后世立法。”^[9]

对于这种寻求治道的中国历史意识,曾有人提出批评。如“中国的历史记录却有一种根本的缺陷,就是只注重政治事件的记录,而对于基层的社会生活却缺乏兴趣”^[10]。这里,陈宣良犯了英国学者J·H·普勒姆同样的错误,他同样以西方现代史学来抨击和否定中国史学,包括从根本上否定古代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方法。在“公民社会”作为一种现代意识还没有产生的古代,以有限的资源去记录纷繁复杂的历史,难道首先最应该被记录下来的不正是国家的政治及管理活动吗?关心“治道”正是中国历史意识中人文精神和入世情怀的生动表现。

二、历史方法论的现代转化

历史方法论的古代形态,是一种建立在有机的历史意识基础之上,以“法先王”“稽古”“殷鉴”“治道”等为主要内容的自成一体的方法论体系。从认识历史、研究历史到运用历史,“历史”在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发展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包括在思想和实践中的方法论作用。

大体而言,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学习和研究甚至解释历史的方法,但在政治实践中充分地总结历史和运用历史的历史方法论,却是中华民族一种重要的文化特点或者说一种重要的实践能力。这种历史方法论既展现了中华文明一种重要的人文精神,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世界观。如前所述,中国人喜欢如其所是地记录历史事实。如孔子所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11]

东西方之间历史意识和历史方法上的差别,来源于二者世界观上的差别。中国人的世界观里有明显的实践化、生活化、世俗化指向,也就是说世界观里包含有处理和应对现世事务的方法论萌芽。世界观决定人生观、价值观,当然也决定方法论。中国“天人合一”的思路就是把抽象王国还原或融通于世俗王国。所以中国哲学中没有纯“无”或纯“有”之类的概念,即便是看似最抽象的概念,也在哲学家的笔下被塞进具体经验性内容。如焦循说:“何为道?道者行也。凡路之可通行者为道,则凡事之可能行者为道也。通而四达不穷者为大道,即为达道。虽通行而致远则泥者为小道,其偏僻险仄,孤危高峻不可通行者非道也。”^{[12]1190-1191}“道有理也,理有义也。何谓理?理者,分也。何为义?义者,宜也。其不可行者还道矣。可行矣,乃道之达于四方者各有分焉,即各有宜焉。”^{[12]1191}但这并不意味着道、理等概念缺乏普遍性,这些概念被运用于历史领域,它们展现的是一种根植于情境与脉络中的具体普遍性,是最大限度地包容了具体性、丰富性、复杂性的普遍性,是深植于质料、内容、个性与情境等等之中的普遍性,这意味着要揭示历史之理、义,必须根据情况、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自我调整。

作为中国古代历史意识一部分的历史方法论,在今天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面貌出现?今天的人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这种来自历史深处的方法论?历史传统可以作为思想资源被传承,也

可以作为方法资源被传承。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通过对资本主义及其哲学的批判而出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也是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借鉴、吸收并有机融合而在中国出场。在对西方哲学的分析批判中,马克思注意到了黑格尔哲学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及其中所体现的巨大的历史感。对于黑格尔的历史观,马克思既有肯定,也有批判。马克思赞扬黑格尔的地方,在于他对现实的分析以巨大的历史感为基础,尽管这种历史感仍以抽象的范畴为环节,但黑格尔的历史观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即它是头足倒置的。在现实的历史面前,唯心辩证法的结果注定是虚无,既不会是历史的注脚,也不会是历史的预见者。

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家尤其是庸俗经济学家们的批评也是基于他们无视历史的经验事实,满足于抽象的思维。“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怎样产生,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13][218]}因此,仅有抽象的经济范畴而缺少历史的“实证”是不够的。

马克思所批判的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唯心主义的历史学和无视历史经验事实的古典经济学,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从概念出发来演绎历史。马克思主义恢弘的历史感和唯物史观对历史的深刻阐释及其贯注的方法原则与中国传统历史方法论似乎有一种“同频共振”,这给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者以巨大的发挥和解释空间。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所包含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法论要求“把人们做过的事情,同现在和未来要做的事情贯通起来加以思考,进而为总结历史规律、分析现实问题,预见未来趋势提供科学的思想武器”^[14]。上述原则和方法,正是中国古代历史意识和历史方法的重要内容。

传统的历史方法论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具有某种程度的契合性,但传统的历史方法毕竟只是体现为一种泛化的历史意识,并未接受现代科学方法论的熏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语境中,传统的历史方法论被进行了现代化的提升。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古代的历史方法论,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的创造性工作,完成了现代转化,形成了有民族文化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论。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其间涌现了一大批对之做出重大贡献的革命家和理论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国化包括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传统历史意识相结合方面,亦涌现了许多著名人物,毛泽东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毛泽东特别注重学习历史,他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15]在系统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前,作为受中华文化熏陶的个体,毛泽东的身上就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和历史意识,特别是中华传统历史意识中那种忧患意识、家国情怀以及寻求国家发展正确道路的使命意识。

毛泽东的许多理论作品特别是比较抽象的哲学著作,以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相一致的原则展开思想,以历史事例和历史经验为素材,从中提炼出哲学原理和方法论原则。也就是说,他用以阐明自己哲学观点的主要论据都是来自于社会历史领域的各种经验材料。总体来看,其理论结论主要来自社会历史深处的智慧。如《实践论》中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关系。”^{[16][282]}从他的思维逻辑可以引出如下的结论:历史是认识和理解事物的一把“钥匙”。《实践论》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把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认识和实践”转换为东方文化背景的“知与行”,表面上只是同类概念的置换,实际上是两种文化场景的置换,也是两种历史场景的置换。当我们接触“认识”“实践”概念时,由于是来自西方的理论概念,所以只能进行抽象的理论逻辑思考,当我们接触到“知”“行”概念时,能进入历史的情景,因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这种概念带有大量的民族的历史文化信息,它让我们沉入历史情境,思考该问题在历史场景中的来龙去脉。于是一种纯理论的概念只有结合历史的方法,才能得到恰当的解释和建构。所以,即便是普通的认识问题,如果不能做到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全面了解,很难把“认识变成科学”^{[16][283]}。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毛泽东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方法来提升和转换传统的历史方法论。

1.“稽古”与“实事求是”

“稽古”,即通过考察古代史迹以明辨是非,为了现实问题而探寻历史。这里面至少包含了三个层次的意涵:其一,历史与现实是相通的,有一条规律性的线索把古往今来贯通起来。其二,历史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历史有其复杂性,但也是有“机”可寻的,通过对历史的稽索,可以寻找到其中的规律。其三,历史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我们认识活动中的客观对象所具有的特征,历史同样具有。在古人的历史意识中,历史不是精神性的存在,也不是一种虚拟的存在,而是一种“实存”。

“稽古”意识包含的对历史的认知,为毛泽东批判改造并把它提升和发展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提供了前提条件。古代的历史意识经过历代古文经学的塑造和发展,再经清代考据学的补充与发挥,发展出一种注重调查研究意识与方法。按梁启超的说法,考据学治学的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考证学直至今日还未曾破产,而且转到别个方面和各种社会科学发生影响。”^[17]明末清初一批学者如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等接续了中国“稽古”传统,并将这种方法从历史场景挪移到现实场景,从而开创了对现实开展调查研究的新传统。毛泽东也正是通过湖湘学脉延续了这种新传统。毛泽东特别注重调查研究,投身革命以后,更是十分关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即便在尚未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的青年时期,传统历史意识演化而来的注重调查研究的习惯早已在他身上明显表现出来,如他的早期作品《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明显体现出这个特点。后来,在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之后,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原理与中国传统的历史方法相结合,发展成我党的著名的思想路线和方法论原则,这个方法论就是“实事求是”。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阐明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态度时指出:“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18]

由此看出,实事求是的方法和思想路线,正是古代历史方法论中的“稽古”原则现代转化的结果,当然,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所完成的蜕变。

2.“殷鉴”与认识的辩证过程

“殷鉴”是中国古代历史意识的一部分,也是古代历史方法论的一部分。殷鉴就是要以历史的反面材料为镜子来照见历史是非与善恶,所以,古人喜欢把“殷鉴”与忧患意识联系在一起,就是因为殷鉴注意的是历史的负面,习惯以反面事例为借鉴,因为担心历史的负面重复发生,故而产生忧患意识。正是这种忧患意识和对历史负面的警觉,催生了大量对历史负面的批判性作品,如贾谊的《过秦论》、柳宗元的《封建论》、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李贽的《藏书》等。“殷鉴”的这种从负面切入历史的方法,既是忧患意识的表现,同时也催生了改革(革命)意识和家国情怀。

“殷鉴”注重从负面切入历史的特点,是与古代循环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密切相关的。循环论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一个从起点开始,不断地分化和衰变,达到低潮,然后经过更新,重新又回归理想状态的过程。当然,这种回归不是回归原点,而是在新的层次上的复归。如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就是以五百年为一时间周期的王者兴亡循环论。北宋邵雍的元、运、会、世的人类演变历史也是一种循环史论,老子的“反”“复”之道同样如此。

这种历史循环论实际上也包含了某种深刻的辩证法,从美好的起点出发,经过衰变走向反面,然后更进一步走向反面的反面,从而达到正面,这不正体现为一个正、反、合的过程吗?马克思所欣赏的黑格尔“巨大的历史感”的地方在于他的概念辩证法的过程性,尽管它是以颠倒的形式存在的。

毛泽东在研究人的认识运动的时候,也是以一种巨大的历史感而展开研究的。把历史意识和历史感贯注到对人的认识运动的研究,把某种历史辩证法转换成为认识的辩证法,这种转换的深刻之处在于一方面通过个体意识形成过程来再现人类历史的不断变换和发展过程;另一方面,把人类历史浓缩成认识的发展史,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人类发展的具体细微脉络。所以毛泽东在分析人的认识活动时说:“实

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16]297}所以,循环历史观所包含的对历史的进步理解与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对事物和历史的进步理解,在方法论层面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总之,中国古典历史意识的“殷鉴”原则,在经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改铸和提升之后,演变成一种认识论辩证法,同时也是认识历史和社会的基本方法。

3.“法先王”与“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如前所述,儒家的“法先王”思想同样体现为一种古代历史意识。“法先王”与传统的祖先崇拜有一定的关系,但它绝不仅仅限于一种宗教意识或宗教形式。“先王”并不是某个具体的“王”或神灵,它毋宁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和文化的符号。“法先王”指人的历史活动服从某种历史的理念和历史的规律。类似于现代话语中的“历史理性”或“民族精神”。它的方法论作用,就是通过复杂多变的历史现象找到一种“历史理性”从而驾驭历史规律。王船山对历史的分析,有利于我们理解“先王”的性质。王夫之用“理势合一”来解释历史运动的规律,他说,“顺必须之势者理也,理之自然者天也”(《宋论》卷七)、“天者理而已矣,理者势之顺而已”(《宋论》卷七)、“势字精微,理字广大,合而名之曰天”(《读四书大全说》卷九)。“理”是指历史的合理性,也叫“合目的性”,“势”是指必然如此不可易移的规律性。理势合一,接近于唯物史观所强调的历史规律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里的“合理性”“合目的性”就是儒家语境中的“先王”。“先王”就是一种历史理性。

可见,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的“法先王”,有一种在历史复杂性中追求历史规律和历史正义的倾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照下,它发展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大原理和方法: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与历史规律。因此,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理性丰富和升华了传统的历史意识。

4.“治道”与“治理”

古代的历史意识有一种追求“治道”的精神,有学者专门研究了中国史官传统与政治的关系。按陈宣良的说法,人类的行为有两种:个体行为和群体行为。对个体行为的记录就是道德训诫;群体行为就是政治行为,对群体行为的记录就是法律。所以历史发挥镜鉴和训诫作用主要是在政治领域,目的是寻找治理之道,即“治道”。因此当历史作为一种方法被运用的时候,主要是用来为国家政治服务的。这就形成了中国的一个传统,即用历史映照现实,且这种现实主要是政治的现实^[19]。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中国人首先接触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如此,除了对于“历史”的敏感之外,还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视角和分析内容是有关历史发展和人类解放的话题,这与国家的政治活动和人们的政治生活息息相关。鉴古知今,学史明智。这里的“古”“今”“智”等概念,包含的核心内容无疑是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经验与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20]也就是说,历史是用来借鉴的,借鉴历史是用来解决现实问题的,而这些现实问题主要集中于国家的治理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即政治性问题。

可见,传统历史方法论中涉及的各种价值关怀和行动路线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历史观和历史方法中得到保存并做了完善和发展。

三、作为一种方法论体系的“历史经验”

传统的历史意识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方法论相结合不仅擦出历史方法论的火花,而且把历史经验提升为一种具有指导地位的历史方法论的当代形态。历史经验曾经是一种方法论运用的结果,现在成了一种方法论运用的起点和过程,也就是这种方法论本身。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延续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每当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通过总结历史经验而获得发展动力的做法。“总结历史经验”成了一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一种重要的方法。“历史”本身成了一种重要的实践方法,这是中国共产党一种重要的理论创新和方法论创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三个重要的“历史决议”都具有“总结经验”的性质,它们都在重要的历史节点上起到了鉴往知来、引领时代的作用。通过对它们的学习和研究,不仅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运用历史方法指导实践,而且可以明了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的内在逻辑与思维方法,更可以领略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因此,“总结经验”成了我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经验。“我们党一步步走过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水平。”^[21]

中国传统的历史意识,经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唯物辩证法方法论的整合与净化之后,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也构成了时代化的党的创新理论的重要内容。传统“历史”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也进一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创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别注重总结历史经验,同时运用历史经验,解决了很多问题,办成了很多大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形成了富有时代特点的总结历史经验的独特逻辑和科学方法,也形成了独特的总结“历史经验”的历史经验。

正是基于对把握历史规律的渴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大历史观”,他所倡导的“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就是这种大历史观的体现,也就是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法论体系,它包括:历史思维、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创新思维等,这些方法的提出和建立,就是为了对历史规律进行更深刻把握。这些方法的集合,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历史观,也就是依托历史而开创未来的方法论体系。我党总结历史经验基本上都是这套方法体系的综合运用。作为一套方法论体系,它包含了以下具体的思维方法。

1. 历史思维

历史思维是“大历史观”中的一种方法论形式,也是历史方法论的一部分。什么是历史思维?就是打通古今,连接今昔,把过去与现在连通起来。注重历史与文化的连续性和整体性,要依托历史而进行时代性的创新和变革。作为一种方法,历史思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

首先,要尊重历史,尊重传统。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个民族的历史包含无数先人的奋斗与创造,是一个民族无数光荣与梦想的记录,每一代人都应当对自己民族的历史保持敬意,这也是对本民族奋斗历程与成果的基本肯定和尊重,这是人们进行后续奋斗的必要前提。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3]585}列宁也说:“我们只能利用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全部知识,组织和机关,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人力和物力的条件下建设共产主义。”^[22]习近平总书记延续了马克思主义深刻的历史感和对历史与传统保持敬畏的传统,结合新的历史实际,充分重视历史精华对现代化的积极作用,他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23]

其次,从历史前提出发,以历史映照现实。“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24]民族的历史传统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这些经验对当今的工作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并可以用来改进当今工作存在的制度和方法上的弊端。当然,历史中也有大量的负面教训,作为一种负面的案例,同样可以发挥警示作用。历史给当代所展示的不仅仅限于一种借鉴和参照,更在于它是一种文化的底色和社会实践的前提,在相互激荡的复杂环境中发挥着一种稳定器的作用。

最后,要把现实事物放到历史的连续性中进行判断。倡导和运用历史思维,就是要运用系统的、整体的视野,把社会事件和历史人物放到历史的长河中、放到历史的过程中去估量。对现代事物的评判,也要放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来看待;对未来理想的信念,也要依据历史的规律与趋势,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上来把握,分析历史渊源和发展去向。

从文明发展的视角来看待历史思维,它实际上源自中国古代历史意识中的“稽古”传统,讲求“顺藤

摸瓜”“旁敲侧击”“伏脉千里”“纵横捭阖”等操作技术的“稽古”原则,经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方法论的引导和提升,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尊重规律、实事求是的思想与方法,进一步结合新的时代化实践,演变成了一种重要的思想与实践方法:历史思维。

2. 辩证思维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一种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我们要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25]这里的辩证思维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内涵上略有不同。唯物辩证法是一种广义的辩证法方法论,泛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和分析事物的方法论,而辩证思维可以说是一种狭义的辩证法方法论,它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的一种具体形式。辩证思维法的特点在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历史维度,也就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历史维度。注重事物的发展性、过程性,因而注重事物的历史性。“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26]由于辩证思维法强化了辩证法的历史维度,即过程性维度,因而打通了历史与现实的隔碍,促进了历史与现实的融合。作为一种历史方法的辩证思维不仅用来分析和观察历史,同样可以用来分析和处理现实问题。所以,辩证思维法特别注重事物发展的历史性和过程性,也特别注重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与转换。

作为一种方法,辩证思维还坚持“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统一。“一分为二”就是把历史传统分为“精华”与“糟粕”两部分,要求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它强调对历史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合二而一”指在区分精华与糟粕的基础上,又要对历史传统采取整体的肯定态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通过学术教育、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多种方式,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我国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27]^[62]

辩证思维借鉴了古代历史意识的“殷鉴”传统,就是通过对历史负面的镜鉴和正面的总结,从正反两方面来认识和理解历史,进而辩证地理解和对待现实世界,展开对世界和事物包括人的认识活动之纵深度、过程性与曲折性的认识,进而又回归到对历史文化价值的确认、对事物与历史前进方向的把握。

3. 创新思维与战略思维

这两种思维方法,突出了唯物辩证法中人通过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主动推动事物变化和发展的特性。脱胎于辩证法,但又具有新的时代特点。它的特点就是借助于对规律的掌握,引导事物的发展方向,通过能动的和自觉的行动来推动事物的发展。所谓创新思维,就是努力以新颖独到的方法解决问题或者努力使事物脱离旧模式旧框架的一种思维方式或思维过程。中国共产党传承了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实践品格,毛泽东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28]毛泽东对人的认识过程的辩证分析,对人的行动逻辑(知行关系)的辩证阐释,对人的认识的螺旋式上升运动的揭示,本身就包含了“创新”思想成分。创新思维本身就来自辩证思维,或者说辩证思维本身就包含着创新思维的成分。辩证思维本是对社会进步和事物发展过程的揭示,创新思维则进一步揭示创新在事物发展中的动力作用。

创新思维同样是历史方法论体系中的一种方法。历史思维打通了古与今的联系,辩证思维揭示了历史过程的复杂性,创新思维则打通了古今与未来的联系,把历史经验向时间的未来维度推进。作为一种历史方法论,它找到了把事物向未来深处推进的内在动力,扩大了历史的纵深度,通过展示人的主动创造而丰富了历史本身。用创新思维对待历史对待传统,就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29],用创新思维处理现实问题就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27]^[74]。

创新思维是与战略思维联系在一起的,创新思维解决事物发展动力问题,通过解决事物的矛盾而推

动创新。战略思维是解决事物发展的方向和全局中的方位问题,都是通向未来和未知领域。战略思维与创新思维一起丰富和扩大了事物发展的历史维度,也更深刻地揭示了事物的历史特征。

总之,创新思维和战略思维都属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但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时代特征进行了提炼,发展成两种独立的思维方法。这两种方法都注重把握事物的未来向度(也是一种历史维度),把历史方法的触角向未来的方向极力延伸,从而增强高瞻远瞩和把握全局的能力。

以上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传统历史意识经过转化和发展之后,所形成的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论体系,也可以叫作总结“历史经验”的方法论体系。

此外,还有人本思维,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改造和转化传统历史意识所形成的又一种思想和工作方法。人本思维之所以属于历史方法论,一方面是因为它是对中华文明历史意识中的民本思想的传承,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必然要总结出的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传统的民本思想经过唯物史观的审视与观照,发展成一种重要的工作方法,它要求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目的都应围绕人民群众来进行。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我们工作成败好坏的评价尺度。习近平总书记说:“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30]

总之,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和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从民主革命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各个历史时期,每当面临重大历史转折,我党都要对历史经验进行系统总结,而每一次系统的经验总结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推动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

从以上“历史经验”所发挥的理论和实践作用可知,我党总结历史经验所遵循的路径是全面综合运用历史方法论体系中的各种历史方法,换句话说,从方法论视角来看待“历史经验”,则历史经验总是通过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战略思维、人本思维等各种思维方法对现实发挥作用,推动社会和历史进步。我们党用发展着的方法论总结历史经验,并运用这些历史经验指导新的实践。实践指向哪里,方法论的触角就延伸到哪里,历史的经验就总结到哪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历史方法论的时代性转化,是一个“合二而一”的过程。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来看待中国历史方法论,它分明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经典范例。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N]. 人民日报,2019-01-04(01).
- [2] PLUMB J H. 过去之死[M]. 林国荣,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20:83-84.
- [3] 陈赅.“见之于行事”与中华文明的历史意识[J]. 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1):16.
- [4] 刘家和. 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68.
- [5] 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05.
- [6] 王夫之. 船山全书:第5册[M]. 长沙:岳麓书社,1996:586.
- [7] 钱穆. 中国学术通义[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 [8] 庄国雄,马拥军,孙承叔. 历史哲学[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35.
- [9] 许兆昌. 周代史官文化——前轴心期核心文化形态研究[M].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312.
- [10] 陈宣良. 中国文明的本质:卷三[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312.
- [11] 司马迁. 史记:卷130[M]. 北京:中华书局,1982:3297.
- [12] 焦循. 焦循全集:第3册[M]. 扬州:广陵书社,2016.
-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4] 肖巍. 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看党史中的治理经验[J]. 国家治理,2021(04):31-32.
- [15]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3-534.
- [16]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7]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0.
- [18]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
- [19] 陈宣良. 中国文明的本质:卷四[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369-370.

- [2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2.
- [21]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6-17.
- [22]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85.
- [23] 习近平.深入开展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活动 为实现中国梦凝聚有力道德支撑[N].人民日报,2013-09-27(01).
- [24]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3-04(01).
- [2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75.
- [26]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02).
- [2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28]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8-1439.
- [29] 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N].人民日报,2014-02-26(01).
- [30]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66.

[责任编辑:严孟春]

From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to “Historical Experience”: On the Historical Method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LIN Guo-biao

(College of Marxism,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methodology refers to not only the methodology of studying and understanding history, but also the ideological and behavioral tendency of widely using “history” itself as a method. “Summing up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is the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of historical methodology in the new era, and is even a new form of historical methodology. The Chinese nation has a deep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such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as the “law of the former king”, “inspection of antiquities”, “reviewing the past” and “governance of Tao” exist in the ancient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the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Chinese Marxists represented by Mao Zedong combine materialist dialectics with traditional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put forward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al methods that involve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dialectical view of history, dialectical epistemology and the mass line. In the new era, Xi Jinping puts forward “a mega-historical outlook”, and advocat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ystem of historical methodology for the Chinese Marxism, so as to promote the contemporary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Historical experience” is a new form of this methodology system. As a methodology system, “historical experience” plays a role in reality through various specific thinking methods, such as historical thinking, dialectical thinking,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strategic thinking, promoting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progress.

Key words: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historical experience; historical methodology; Sinicization of Marxism